

# 民国初年北京窝窝头会 及其义演考析

郭常英 梁家振

**摘要:**窝窝头会是民国初年在北京出现的民间慈善组织,多于每年冬季年关之时发起筹赈与慈善救济活动,因起初以制作和分发窝窝头的形式救济贫寒穷人,故名“窝窝头”会。该会以举办年终娱乐表演——“义务戏”发起募捐筹赈,具有较大社会声势:艺人参与度高、演出规模庞大、戏码精彩;北京军、政、商各界要人慷慨解囊,对窝窝头会及其义演活动给予较多支持和关注;对救助穷人、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一定作用。随着北洋政府退出历史舞台,该会在北京的活动逐渐衰落。

**关键词:**窝窝头会;慈善组织;年终义演;贫困救济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9)03-0133-12

民初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首都北京的社会贫困问题相当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民众生存。针对贫困施救的民间组织和慈善活动甚为复杂,学界对此已有初步关注。<sup>①</sup>其时,还有一另类应急救助——窝窝头会义演募捐,因参与者不仅身份、名号特殊,也颇具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相关活动给后人留下了深刻记忆。学界有关窝窝头会的学术探讨起步不久,相关概念及认识尚未清晰,一些史料记载及人们的记忆表述也存有史实不清或混沌模糊之处,<sup>②</sup>因此有必要对窝窝头会的相关问题,如组织构成、义演运营及社会文化特征等进行考证与分析,以便澄清史实与模糊认识、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

作者简介:郭常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近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梁家振,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南开封,47500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03)阶段性成果。

① 如王娟:《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丁芮:《从北京游民习艺所看传统慈善向近代慈善的转变》,《社会工作》2012年第12期。

② 目前仅见陈庚《传承与新变:近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戏剧市场研究(1912-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有所涉及,肖瑞宁《民国社会慈善事业的遗珠——北京临时窝窝头会》(《北京档案》2017年第3期)一文对此进行了初步考察。

## 一、组织性质考辨

窝窝头会是民国初年北京慈善组织,因举办年终义演——“义务戏”在当时声势很大。报刊记载与后人回忆虽多有提及,然对其概念和性质表述经常混淆,常有将窝窝头会视作义务戏的情况,可见人们对于窝窝头会的认识至今尚不清楚。有关窝窝头会的谈论,散见于民国时期的报刊记载与当事人的回忆著述,对今天的学术研究有持续性影响,其中某些分歧应予以澄清,以下就相关问题分别进行考证和分析。

### (一)“窝窝头会”是“慈善组织”不是“戏”

窝窝头会是组织名称还是演出活动,在一些学者著述或艺人回忆中常见有不同的表述。于建刚在《中国京剧习俗概论》中谈到,“搭桌戏”“窝窝头会”和赈济灾荒的“义赈戏”等,均可视为慈善性的募捐戏,进而认为窝窝头会是由“京剧行会(早期为梨园公会,民国后为正乐育化会)发起,一般在年末举行的演出,目的是为京剧界贫苦同行筹措过年所需费用”<sup>①</sup>。另有著名京剧琴师徐兰沅在《精忠庙与窝窝头会》一文中回忆说:“每年临近春节时,名演员集中唱两天戏,将收入的钱作为救济贫病老残的、以及生活苦的艺人,使他们能顺利度过春节,因名为临时窝窝头会。”<sup>②</sup>再有翟鸿起所著《老票说戏》一书,对此谈道:“‘窝窝头会’是过去梨园界集体举办的公益慈善活动。临近旧年关,在京的名角为同行中的孤苦艺人及生活困难的已故艺人家属,办一两场演出,所得收入全部捐给梨园公会,分发给过年困难的同行。”<sup>③</sup>上述说法,显然认为窝窝头会是“戏”而不是“组织”。

另有相反意见,认为窝窝头会是一典型的民间组织。如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一书中指出:“窝窝头会者始于清末,慈善团体之一也。京师贫民转黍屑蒸而食之曰窝窝头。此会专为救济贫民,故以名焉。”<sup>④</sup>这里表明,窝窝头会是一个出现较早且独立存在的慈善组织。另有历史记载反映,有两个主体在同一时期连续举办了三场济贫义演,表明窝窝头会是独立的社会组织:“名伶等由旧历廿四日至廿六日,连夜在第一台演育化会、窝窝头会义务戏,均极踊跃从事。”<sup>⑤</sup>“今年已由正乐育化会商请京中名伶,定于二十四日(星期六)晚间在第一舞台演义务一夜。”“窝窝头会义务戏,已定二十五、二十六两晚,亦在第一舞台奏演。”<sup>⑥</sup>此次义务戏结束后,两个团体分别在报纸上公示各自募捐数额,正乐育化会共得票款4465元,向伶界贫苦者散放赈款,每人现洋一元五角。<sup>⑦</sup>窝窝头会“既得善士之捐助,又有伶界之演戏”,收入米面61651斤,现洋10848.24元、中票865元、铜元856吊900文,用于购买米面20余万斤,共计向北京贫民散放米面262051斤。<sup>⑧</sup>

① 于建刚:《中国京剧习俗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第209页。

② 徐兰沅口述,唐吉整理:《徐兰沅操琴生活》,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年,第106页。

③ 翟鸿起:《老票说戏》,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

④ 夏仁虎:《旧京琐记》,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184页。

⑤ 《第一台之三晚义务戏》,《顺天时报》1922年1月26日。

⑥ 《星期六晚第一舞台之好戏 筹款救济伶界贫户之义务戏》,《京报》1921年1月19日。

⑦ 《义务戏捐之分配》,《顺天时报》1921年2月6日。

⑧ 《窝窝头会收支总结》,《京报》1921年2月16日。

民国时人对北京窝窝头会的性质有明确记载。即使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北京失去首都地位降格为北平市后,窝窝头会活动明显减少,但作为独立慈善组织举办义演的记载仍能见诸报端。如1932年《大公报》消息称:“北平有大规模义务戏(一为同业窝窝头会筹款、一为北平冬赈)。”<sup>①</sup>1935年,“梨园失业人数,无形增多,本年窝窝头会义务戏,将扩大举行”。<sup>②</sup>

鉴于以上考证分析,可以明确:第一,民初北京临时窝窝头会是一社会慈善组织,而非一种演出活动。第二,作为临时性慈善组织,该会以充饥之“窝窝头”命名,意在帮助当地贫民度饥寒、过春节。第三,窝窝头会举办义演募捐,既有年终为艺人募捐的行内济困自助,也有为所有社会民众募捐的困难救助。因此,将此期的窝窝头会看作是艺人团体同业自助而演出的义务戏,应该说是一种误解。

## (二)发起人及其骨干成员

关于窝窝头会的创始人,见有“陈启沅”“陈启元”和“程启元”三种说法。一种见于《精忠庙与窝窝头会》一文,所言该会发起于1926年前后,“由北京琉璃厂赏奇斋古玩店的掌柜陈启沅(是一位京剧爱好者)联络了张彬舫、何卓然与梨园界的名演员共同兴起的”。<sup>③</sup>发起人为“陈启沅”。另一说法源于1921年1月14日《申报》上的《纪北京窝窝头会》一文,其中明确记载“该会之由来,最初发起人为陈启元”。<sup>④</sup>显然,此说与前述陈启沅的名字同音不同字。这两种说法都值得推敲。第一种说法提到陈启沅在1926年发起窝窝头会,但《申报》文中记载,该会发起时间早于1921年。经查,历年对窝窝头会创办时间的表述多见于1921~1926年的报刊记载。此外,近代有位名叫陈启沅的慈善家——继昌隆缫丝厂创始人,<sup>⑤</sup>而他1905年已逝世,主要活动地区在广东而非北京。可见,陈启沅发起说可以排除,且陈启元和陈启沅并非同一人。

对此,笔者再查与创始人相关的北京琉璃厂古玩店赏奇斋及其有关组织者的史料,发现了报纸上的准确记载:“京师历年冬令,士绅等筹办之临时窝窝头会为程君启元之首创。”<sup>⑥</sup>其人相关情况如下。

程全仁,字启元,河北冀县人,是北京著名慈善家和京剧爱好者,参与创办龙泉孤儿院。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12年,程启元曾到上海举办义务戏筹款:“龙泉孤儿院办事人道兴、程启元、张古峰,因该院经费拮据,到沪募捐经费。”<sup>⑦</sup>此类募捐活动,《京报》文章也可证实:“北京历年办理慈善之举,惟有每年冬令已故程君起元办理窝窝头会为最著成效。”<sup>⑧</sup>程启元1920年去世的信息,也从侧面证明该报道与《申报》所述“陈启元”系同一人,陈启元为程启元的笔误。可以推测:《申报》在上海主办,窝窝头会在北京活动,一南一北,对陈、程二字的发音不同,容易混淆,记录中出现误差的可能性较大。事实究竟如何,虽无从考证,但可确定的是,窝窝头会的发起人为琉璃厂赏奇斋的古董商人程启元。

考察历年窝窝头会的发起过程,可进一步验证程启元系发起人。该时期常有慈善组织者在报刊发

① 《北平又有好戏看》,天津《大公报》1932年1月30日。

② 《旧京剧屑》,天津《大公报》1935年12月15日。

③ 徐兰沅口述,唐吉整理:《徐兰沅操琴生活》,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年,第106页。

④ 《纪北京窝窝头会》,《申报》1921年1月14日。

⑤ 熊月之等编著:《大辞海·中国近现代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187页。

⑥ 《临时窝窝头会之扩大》,《顺天时报》1921年1月8日。

⑦ 《商办新舞台 十月三十即礼拜日日戏 北京龙泉孤儿院筹费演剧》,《申报》1912年12月6日。

⑧ 《续办窝窝头会》,《京报》1920年11月16日。

布消息,告知大众年关将至,斯会为救助穷人筹募物资等,捐助地常设于北京琉璃厂古玩店赏奇斋。关于赏奇斋的故事,见《琉璃厂史话》记载:赏奇斋先由张楼村出面经营、醇亲王载沣出资,匾额为徐世昌所题。张楼村约于1910年去世,续由程启元经营。<sup>①</sup>程启元1920年去世后,窝窝头会会长由江宇澄继任。对此,报纸记载称:“现在程君病故,已公举江宇澄、陆慎斋二君为正副会长,杨润斋为经理,仍继续进行,以维善举。”<sup>②</sup>江宇澄为重要组织者之一,曾多次出面与张彬舫、任润山等北京善士一同发起窝窝头会,并见诸报端:“自今岁程君逝世后,该会业已涣散,现在江君宇澄张君彬舫鉴于今年荒旱,京师贫民较往年加多若专仰粥厂恐未普及,兹拟仍尽程君初旨,赓续办理窝窝头会,其地点仍在琉璃厂中间赏奇斋为会所。”<sup>③</sup>江宇澄即北洋时期著名政界人物江朝宗,北洋政府时期曾任国务院代总理。江宇澄是其别名。1917年,江宇澄在安徽筹振公所督办任上之时,便于年关邀请戏班“名角演唱数日,以资振济”。<sup>④</sup>1921年江宇澄退出政坛后,以“民国伟人”、社会名流身份从事社会活动,曾担任北京悟善社<sup>⑤</sup>社长,办理慈善事务。在江宇澄的组织 and 影响下,段祺瑞、钱能训、陆宗舆等曾经的政治人物也成为悟善社的成员,“悟善社一时成为部分北洋政要下野后的聚集之地”。<sup>⑥</sup>继任副会长陆慎斋(笔名陆哀)是民国初年报刊界著名记者、《群强报》创办人和总主笔,也是一位京剧爱好者。窝窝头会经理杨润斋是程启元的徒弟,1920年5月程启元去世后,赏奇斋由杨瑞斋继任经营,负责窝窝头会筹募物资等事务。

表1 1919-1924年北京窝窝头会部分骨干成员<sup>⑦</sup>

年份	发起人
1919	程启元、王得胜、张彬舫、任润山、何卓然等
1920	江宇澄(正会长)、陆慎斋(副会长)、杨润斋(经理)张彬舫、任润山、何卓然等
1921	江宇澄、杨钦三、袁俊亭、刘子波、李达三、申静轩、陆慎斋、熙宝臣、乌泽声、张彬舫、乐荫荪、刘竹溪、年泽川、茹养源、丁厚斋、英子敬、春芳洲、杨伯清、戴正一、杨曼青、王丹忱、丁善丞、贺寿民、石博泉、李永明、任润山、李士园、颜慎夫、何麟阁、杨玉堂、傅文卿、俞振庭、李翰臣、戴兰生、何卓然、杨润斋
1922	杨钦三、袁俊亭、张彬舫、丁厚斋、贺寿民、杨润斋、刘铁夫、俞振庭、赵鹤舫、杨玉堂、何麟阁、任润山、何卓然、张仲明
1923	王懋宣、潘丹亭、杨钦三、袁俊亭、申静轩、张彬舫、孙晋卿、乐砥舟、李实枢、杨伯清、年泽川、赵鹤舫、田政臣、丁厚斋、陆慎斋、杨曼青、丁善丞、延少伯、汪侠公、贺寿民、李毓如、戴正一、王丹忱、杨润斋、俞振亭、高文倾、平季安、戴澜生、王小楼、何卓然、李瀚臣、任润山
1924	杨钦三、任润山、何卓然、李瀚臣、鲍墨林、王远亭、吴阔亭等

关于窝窝头会的骨干成员,除上文所谈程启元、江宇澄、陆慎斋和杨润斋之外,参与活动较为频繁的还有张彬舫、任润山、何卓然等人,从可查证的身份背景得知,他们大多是北京社会名流。其中,张彬舫

① 陈重远:《琉璃厂史话》,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88页。

② 《窝窝头会更换会长》,《晨报》1920年12月4日。

③ 《续办窝窝头会》,《京报》1920年11月16日。

④ 《又将演剧酬赈款》,《晨钟报》1917年1月11日。

⑤ 悟善社,又称“世界六圣宗教大同会”,是民国时期的民间宗教组织,1915年由四川人唐焕章创设。该社混合儒、释、道、天主、耶稣、回回六教的教义作为信仰的根据,各地设有分会。

⑥ 密素敏:《从档案资料看民国时期的救世新教》,《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5期。

⑦ 此表据1919-1924年《顺天时报》《京报》《晨报》等相关信息综合编制。

长期为醇亲王府大管家,窝窝头会会所——赏奇斋与醇亲王府有渊源,或因这一渊源使张彬舫与程启元之间有密切联系,程启元成为窝窝头会的最初组织者。张彬舫为醇亲王府管家,未在政府任职。但他“与军政大员都有相当密切的往来,特别是和奉系方面的张作霖、张景惠、汤玉麟等,都是盟兄弟”<sup>①</sup>,出面组织窝窝头会有实力,也有号召力。另一位骨干任润山,曾任旅店行商会会长,系窝窝头会早期发起者之一。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任会长杨钦三因属直系而被捕,“会员等失去领袖无处募捐巨款,遂使慈善事业陷于停顿”,<sup>②</sup>11月任润山继任会长一职。据报纸记载,任润山“对于社会公益各事,极为热心,勇往直前,殊如窝窝头会、梨园公益会、暨其他种种义务戏,奔走帮忙,以期奏功”,<sup>③</sup>为此他最终积劳成疾,1928年2月去世。何卓然(又名何德铨),著名报人,曾任《实事白话报》总编辑,有关窝窝头会慈善活动的大量文稿,都由他以“卓然”或“德铨”之名发表。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窝窝头会骨干成员多喜爱戏剧,或为戏界艺人,以举办义务戏筹款作为慈善活动经费,甚为方便;骨干成员与报界关系密切,便于募捐义演的推广和宣传,使得窝窝头会有较高的社会公信力,促进活动产生广泛社会影响;骨干成员与北京军、政、商界有密切的关系,能为募捐和赈济活动提供可靠的政治与经济保障。

## 二、义演活动考析

窝窝头会作为一个临时性慈善组织,主要通过举办“年终义演”募款。临近年关,穷人忍饥挨饿、穷困潦倒,生活尤显悲惨,而饱食终日、生活无忧的富人,则往往喜好以休闲、娱乐活动度日。义演以娱乐方式筹款做慈善,吸引了一些喜好戏剧的官商善士主动捐款。为取得社会公信力,窝窝头会组织义演活动还有较多环节,据文献记载,如此筹款自始至终都有一定程序,“所有收入支出米面及一切款项,均有详细报告,俟征信录印妥后,即行送达诸大善士座右,以资参考”。一般情况下,“信笺、纸张、邮票等由赏奇斋捐助,捐启、面票、征信录等由孤儿院捐助”。<sup>④</sup>义演所筹戏资,由戏界艺人移交窝窝头会,再由窝窝头会购粮并发放。公开的筹募程序为其获得社会资助提供了良好的公信力。

窝窝头会的义演活动,既增加了该组织的善款数额,聊补穷困贫民的一时之需,也在当时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对此期窝窝头会的义演活动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中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 (一)由传统向近代嬗变及其合作效应的出现

晚清时期慈善义演出现,从表演内容看,类型较为单一,多是艺人演唱传统名剧唱段——“义务戏”,此为传统义演。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革,慈善义演也发生变化。时至民初,义务戏仍为慈善义演的主要内容,如窝窝头会历年在北京第一舞台举办由京剧名角出演的义务戏。岁月更迭,义演内容逐渐发生变化。以1919年年底窝窝头会的一场义务戏为例,演出已不限于戏剧了,除“名伶王又宸、俞振庭、贯大

① 溥佳:《1924年溥仪出官前后琐记》,《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2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231页。

② 《窝窝头会停顿 穷人之大不幸》,《顺天时报》1924年11月15日。

③ 《敬悼任润山君》,《顺天时报》1928年2月18日。

④ 《临时窝窝头会声明》,《顺天时报》1921年2月17日。

元、郝寿臣、小翠花、余幼琴等……假天乐园演唱夜戏”之外,同时演出的还有单弦、幻术等曲艺节目,“班底为斌庆社,并串韩敬文之幻术,荣剑尘之单弦,彭月楼之特别技艺”。<sup>①</sup>考查随后几年的“义务戏”,更增较多表演内容,如相声、双簧、戏法、大鼓等。如1925年窝窝头会义演,京剧剧目由斌庆社成员演出,此外还有“徐狗子、常旭久之双簧,焦得海、张寿臣之相声,快手卢之戏法,白云鹏之文明大鼓,王讽咏之西河大鼓”<sup>②</sup>。“义务戏”内容的变化,显示了慈善义演的嬗变。兹将1919至1927年窝窝头会义演的节目整理为表2。

表2 1919-1927年窝窝头义演的表演品类<sup>③</sup>

时间(旧历)	演出场所	表演品类
1920年2月2日(1919年腊月十三日)	天乐园	京剧、幻术、单弦、特别技艺
1920年2月3日(1919年腊月十四日)	天乐园	
1923年1月20日(1922年腊月初四日)	吉祥园	京剧、大鼓、相声、双簧
1923年1月21日(1922年腊月初五日)	吉祥园	
1923年2月4日(1922年腊月十九日)	吉祥园	京剧、双簧、相声、大鼓
1923年2月5日(1922年腊月二十日)	吉祥园	
1923年12月2日(十月廿五日)	吉祥园	京剧、大鼓、单弦、戏法、对口相声、秦腔剧、时调小曲、滑稽大鼓、蹦蹦戏
1923年12月29日(冬月廿二日)	庆乐园	京剧
1924年1月10日(1923年腊月初五日)	吉祥园	京剧、大鼓、双簧、单弦、戏法
1924年1月11日(1923年腊月初六日)	吉祥园	
1925年1月18日(1924年腊月廿四日)	吉祥园	京剧、双簧、相声、戏法、文明大鼓、西河大鼓

窝窝头会自1919年农历腊月开始,每年举办义演。由表2可见,在1919、1922、1923、1924年农历年终,慈善义演以京剧表演为主,之外还有不同类型的非戏剧演出,并呈逐年增多趋势,这些表演品类的出现,反映出义演随着娱乐方式的多样化逐步扩展。此期窝窝头会的慈善义演,已经具有从传统转向近代的过渡性特征。

年终义演逐渐发展并出现团体协作,窝窝头会举办义务戏筹款,曾与世界红卍字会联合举办。1927年窝窝头会出现了“双季”义务戏,1月18、19日有两晚义务戏,5月27、28、29日有三晚义务戏,均为窝窝头会和世界红卍字会联合举办。5月27~29日的三晚演出,前两晚售票所得资金归窝窝头会,用于购买玉米面救济贫民;第三晚售票得资,“悉归世界红卍字会翻修道院之建筑费”。<sup>④</sup>此外,窝窝头会还与剧场合作联办义演。窝窝头会的义演活动除了在第一舞台之外,另一处位于东安市场的吉祥园。吉祥园的园主王小楼是窝窝头会的成员,不收剧场租赁费用,据记载:“吉祥园主王小楼愿在该园演窝窝头会义务戏,微费不收,同人极感其德。”<sup>⑤</sup>此外,在窝窝头会的义演剧目中,吉祥园比第一舞台的演出更丰富,名角

① 《演剧筹款济贫》,《顺天时报》1919年12月27日。

② 《窝窝头会筹款 演义务戏》,《顺天时报》1925年1月16日。

③ 据1919~1927年《顺天时报》《京报》《晨报》等记载综合整理。为免繁琐,表中未列窝窝头会历年在第一舞台举办的京剧义务戏表演。

④ 《第一台义务夜戏 窝窝头暨红卍字筹款》,《顺天时报》1927年5月26日。

⑤ 《富连成社演窝窝头会义务戏感言》,《顺天时报》1923年1月21日。

云集的场面不时出现。1925年窝窝头会义演,主要京剧戏目由斌庆社成员演出:“李万春、蓝月春之《两将军》,俞步兰、小桂花、徐斌寿之《虹霓关》,魏连芳之《天女散花》,陈葵香之《打棍出箱》,俞少亭之《东昌府》,大轴俞华亭、陈富瑞之《溪皇庄》。”该场还兼有其他曲艺表演。此次义演,所有演员及演出场地均不收取费用:“所有上场艺员、以及吉祥园、均尽纯粹义务。”<sup>①</sup>

此时义务戏由不同性质的民间团体联动合办,当有三重意义:一是扩大了义演活动的社会影响,二是扩展了窝窝头会举办义务戏救助范围的宽度,三是增强了合力组织慈善活动的功效。

## (二)义演筹款收效向好,戏资为善款重要来源

年终义务戏规模盛大,所以窝窝头会义演多在场面较大的第一舞台和吉祥园举行。第一舞台位于前门外西珠市口大街中段路北,是民初北京款式最新、容纳观众最多的大戏院。观众席分为三层:一楼设池座和廊座,二楼设包厢,三楼通设散座,共可容纳观众2600余人。<sup>②</sup>通过戏园座位票价情况,可知筹款收获。1919年冬季,窝窝头会在天乐园的义演,所有座位票价统一,“戏价定大洋一元,不分等次”。<sup>③</sup>1921年农历腊月,窝窝头会又在天乐园举办义演,此时票价已分为“一元二元三元三种”。<sup>④</sup>1922年农历腊月,所见票价等差增多,“包厢分六十元、五十元、三十二元,共分三等,散座售四元、三元、二元、一元,共分四等”。<sup>⑤</sup>1927年5月,窝窝头会在第一舞台举办义演,票价划分更为细致:包厢一级一百元、二级六十四元、三级三十二元,正厅(即前七排)八元,中厅(即中七排)五元,前厅(即后七排)三元,旁厅前五排三元,后十八排二元,包厢背后二元,二层楼木炕四元,三层楼前三排三元,后四排一元。<sup>⑥</sup>座位票价由不分等次向分等次的改变,表明主要照顾到社会不同阶层的需要,保证更多的观众购票入场;如此也能提高门票收入和座位使用率,吸收更多民众参与慈善活动。

募捐义演的票价一般高于日常娱乐演出。已有研究表明,“义务戏的票价比平常演出票价高出好多倍,而且从民初到民国中后期,义务戏的戏价也大幅上涨,但是,义务戏仍旧具有极高的上座率,义务戏彰显出在筹集资金方面的巨大能力和作用”。<sup>⑦</sup>从上述新式戏院第一舞台的票价看,票价等级的逐渐确立是对捐款群体进行一种财力区分,一方面提高了富人观戏捐款的标准,另一方面降低了平民购票观戏的门槛,扩大了市民看戏和捐款的范围和机会。由当时报刊经常出现的“票券已售尽”“捐款异常踊跃”的报道,可见窝窝头会的筹款应属可观。

年关临头,对于贫困穷人的救济最为紧要。梨园行一般对年末义演尤为重视,所谓艺人极重义气,在年末封箱歇业前的义演中表演也最为精彩,“梨园行年例封箱,而对于封箱前后又有大义务戏”<sup>⑧</sup>无不重视,“梨园行人声誉最巨者,莫不上台献艺,竭其义务”。<sup>⑨</sup>这些报纸记载,既反映了戏界艺人救贫扶困

① 《窝窝头会筹款 演义务戏》,《顺天时报》1925年1月26日。

② 刘文峰、于文青主编:《北京戏剧通史·民国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450页。

③ 《演剧筹款济贫》,《顺天时报》1919年12月27日。

④ 《第一舞台三日义务戏戏目》,《京报》1922年1月21日。

⑤ 《窝窝头会夜戏 地点第一舞台》,《京报》1923年1月5日。

⑥ 见“世界红卍字会北京窝窝头会”1927年5月28日戏单。

⑦ 陈庚:《传承与渐变:近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戏剧市场研究(1912-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28页。

⑧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文献类编·文化艺术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207页。

⑨ 《万绿点红 临时窝窝头会之义务戏》,《顺天时报》1921年1月8日。

的义气,也展示了窝窝头会义演的精彩。窝窝头会的慈善募捐,虽为年终“临时”活动,但每年筹款所得达数千至万余元,其中除少数善士捐款之外,主要是义务戏的戏资,义务戏成为慈善募款来源之大宗。以1922年年末“演剧筹款”为例,窝窝头会“冬月廿一、廿二日演出”,两天义演所筹之款“不下数千元”,“所得赈款以保定作寿及第一舞台演戏为收入之大宗”,此为该年窝窝头会救济北京贫民的资金的主要来源。<sup>①</sup>

### (三)义演现场捐赠

窝窝头会义演,除出售门票所得票款之外,也接受现场临时捐助。捐款捐物者多为窝窝头会发起人和参演艺人,也有观看演出的军政要员、政府机构人员以及商界人士等。如1920年,京畿警备总司令的段芝贵捐玉米面一万斤,刘子波统领代募玉米面二万斤。<sup>②</sup>政府方面,除有军政要员以个人名义直接捐助之外,还有一些部门(如粮食救济会、京师警察厅、教育局、京奉路局等)的捐助,金融界如新华银行、裕华银行、中国银行、热河兴业银行等的捐助;电灯公司也向窝窝头会捐款捐粮。各方人士对窝窝头会组织义演募捐捧场,反映了社会各界对慈善事业的支持。

商人现场售货捐赠货款,也是临场捐助方式之一。窝窝头会义演,总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参加现场义卖。1923年在吉祥园的义务戏,“南洋烟草公司,捐助售烟洋二十四元二角、铜元一百八十五吊五百文,长春堂捐助售避瘟散洋十五元九角、铜元一百八十吊零八百文”,两天售票得款“共计大洋七百七十五元八角”。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长春堂两家企业售出商品的捐款,有“大洋三十元、铜元三百六十六吊三百文”。<sup>③</sup>从这些零碎记录看,此项收入在筹款总额中占比不算小。商家现场售卖、捐款表达善意,既为产品做宣传,还承担了社会责任,树立自身良好形象,可谓一举多得。

### (四)“演剧筹赈”汇聚众多名角与名班社

在北京戏界,以梅兰芳、程砚秋、杨小楼、俞振庭、郝寿臣、余叔岩等为代表的京剧名角,每遇义务戏表演,总会有他们的身影。有些名角不仅参加演出,还承担义务戏的一些剧务费用。如1922年年终在第一舞台的义务戏演出,京剧名角盖叫天承担了当天所有的后台开销。窝窝头会对他热心慈善的事迹与精神予以高度评价和积极回应——赠予盖叫天一座“大银杯”。报纸记载当时的境况,说此剧“所有后台开销均由盖叫天担任,故该会特赠与大银杯一座,文曰:‘热心慈善’,上款:‘英杰先生惠存’,下款:‘临时窝窝头会敬赠’”。<sup>④</sup>可见此时伶人参与慈善义演,不仅赢得了好名声,也为其群体树立了积极的社会形象。<sup>⑤</sup>

历年义演筹款,除了名角登台表演之外,还有一些科班参与演出。在民初北京的京剧界,戏班要属富连成社、斌庆社、三乐社(后易名正乐社)和福清社最具影响,“人材最鼎盛,世称四雄”。<sup>⑥</sup>其中较大的是富连成社与斌庆社,两家作为同行,平时相互竞争,极少合作。在窝窝头会历年举办的义务戏中,两社

① 《临时窝窝头会成绩》,《京报》1923年1月11日。

② 《天乐园义务戏之结果》,《顺天时报》1920年1月8日。

③ 《窝窝头会 吉祥园之成绩》,《京报》1923年1月23日。

④ 《窝窝头会筹款演戏》,《顺天时报》1922年12月8日。

⑤ 岳鹏星、郭常英:《晚清都市空间中的慈善、娱乐和社群认同——以慈善义演为视点》,《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⑥ 唐伯弢:《富连成社三十年》,中华书局,2014年,第4页。



皆积极参与并时有合作,如1927年1月18、19日的义务戏,开场戏目分别为《富贵长春》和《天官赐福》,均为富连成社的拿手戏目,由该社全班学生合演。18日的《宝莲灯》,演员李万春和蓝月春均为斌庆社的主要搭戏成员。可见义务戏打破了戏班之间的隔阂,促进了艺人合作。值得注意的是,斌庆社社长俞振庭是窝窝头会的发起人之一,1921年腊月二十五、二十六日窝窝头会义务戏,即由俞振庭发起,并将演剧“所得票价全数捐助窝窝头会以救济贫民”。<sup>①</sup>

### 三、社会-政治生态的产物

北京“临时”窝窝头会的慈善活动,活跃于民初北洋政府时期。根据文献记载,该组织“演戏筹款”救济贫民的义演活动,多在1919~1927年冬季举办,也确实为救助当地贫民和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较大的能量和作用。窝窝头会的慈善活动与义演募捐能形成影响、有如此成效,与民初北京的社会-政治生态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这一现象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态的产物。

#### (一)北京社会现状是慈善组织出现的根源

清末民初,北京地区有大量贫困人口,社会贫困化与普遍化特征十分明显,形成如此局面,根源于政治腐败、经济衰落、战乱不绝,还有灾荒肆虐等原因。清朝灭亡后,大量失去生活保障的闲散旗人亟待救济。北京地区来源驳杂的庞大流民群体一直是社会秩序稳定的隐患。对此,统治者曾深为忧虑和恐慌:“强壮者流为盗贼,老弱者转于沟壑……民不聊生,人心思变,更何堪设想。”<sup>②</sup>至民国初年,这种情况并未得到改善,“自鼎革后……复困天灾人患之种种变化,社会生计益形窘迫,内外九城号寒啼饥者触目皆是。或则投河自尽,或则觅井倾生,或因冻馁无依缢诸梁上,或因穷途无告倔强屋中。惨哉矣,饥寒之逼人!都门首善之区竟成贫民业聚之窟”。<sup>③</sup>

大量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加大了北京城区人口的生存压力。民初年间,京畿直隶各地的水旱灾荒尤为严重,以1920年为例,“京兆(原顺直地区)、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山西5省1区,继光绪‘丁戊大浸’之后发生‘四十年未有之奇荒’”。<sup>④</sup>北京城内的贫民已为数不少,临近京畿居住的灾民在遭逢天灾人祸之后,习惯性地涌入北京城以寻求各方救济,因此北京人口增长很快,至1922年已达841945人。<sup>⑤</sup>随之而来的是北京贫困人口数的激增。窝窝头会曾对当时的贫困人口进行了调查:“临时窝窝头会,前曾委托各区署,将各该界之贫民,代为调查。据内外城二十区署所查之详数,分为二种,极贫者共17741户,共人72651名口;次贫者共5993户,共人26336名口。”<sup>⑥</sup>如此分析,北京当时的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1.7%。

内乱不断、机构松散的北洋政府,难以承受灾民不断增加所带来的社会压力,由民间团体的慈善救

① 《伶界义举济贫》,《顺天时报》1922年1月16日。

②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515~516页。

③ 刘锡廉:《北京慈善汇编》,基督教青年会,1923年,第67~68页。

④ 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官明:《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6~337页。

⑤ 参见丁芮:《管理北京: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0页。

⑥ 《窝窝头会成绩》,《京报》1923年1月20日。

助协助稳定社会秩序成为必然。1924年9月,窝窝头会发起筹款之因即为:“本年顺直水灾浩大,披灾难民流落京师者,亦较往年为多,加以生活程度日高,北京之困苦贫民亦必增加,救济贫民实不可缓。”<sup>①</sup>庞大的贫困人口数量、连年灾荒和战乱所引发的灾民入京等,促使窝窝头会这类以救济贫困市民为目的的慈善组织的产生。

### (二) 政府政策倡行、军政要员与社会人士共同推动慈善活动

民初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繁,北洋政府无法应对京畿日渐严重的贫困化问题,以及衍生的一系列社会危机,因此将希望寄托于民间力量,特别是各类慈善组织身上。1914年8月,政府颁行《义赈奖劝章程》,就民间义赈制定了积极政策:“鼓励社会各界捐款赈灾,达一定数额者由政府予以奖励。”<sup>②</sup>政府的新政策,无疑助推了社会救助行为的开展,也为慈善事业提供了发展空间。以京师警察厅为代表的政府管理部门,也开展慈善活动,“在1915年末至1916年初的冬季,京师警察厅负责的7个粥厂每月施粥总数都在30万人次以上”。<sup>③</sup>较之政府开设粥厂施粥的救济形式,窝窝头会以所筹之款代购粮食、印制面粮票券和划分贫困级别,实施有差别的救助,类似救济活动与政府的施粥活动相互补充。

政府一些机构和部门参与义演捐助,除京师警察厅、教育局、京奉路局等官方机构均有捐输之外,军政要员以个人名义的直接捐助较为突出。1921年,巡阅使曹仲珊(曹锟)捐玉米面二万斤,将军鲍贵卿捐大洋一百元,巡阅使吴子玉(吴佩孚)、将军汤铸新、司令杜锡珪、议长边守靖各捐大洋五十元。<sup>④</sup>其他相关记载还有很多。此时,这些军政要员支持窝窝头会的慈善事业事出有因,“俾得一般贫民受惠给,而暗中亦保护地方治安,此为一举两得之善举”。<sup>⑤</sup>政府方面非常明白,窝窝头会义演募捐凸显强烈的民间慈善意义,政府的参与和互动有益于维护社会稳定。

大灾之年粮食紧缺,有些不法商人借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因此窝窝头会募捐和义演所筹善款并非直接发放,而是代购玉米面或小米发给贫困户。1922年玉米面价格上涨,窝窝头会委托会员从外地代购小米,<sup>⑥</sup>在向贫民发放米粮之前,依据京师警察厅的统计数据印制相应数量并具有一定面值的票券,划分出极贫和次贫两等发放标准,对贫民进行有差别的救助。“京师临时窝窝头会,昨印刷二斤一张玉米面票三万张,托由提署警厅在各粮店代购玉米面六万斤,并令粮店在面票上加盖于即,缴回该会,以备定期散放。”<sup>⑦</sup>农历1922年腊月,共向20个区的贫民拨放小米731石(每石156斤),玉米面197954斤,米面合计31.2万斤。“极贫者每人应领平米一升面二斤,次贫者每人仅得面二斤而无米,以昭公允”。<sup>⑧</sup>这种有差别的散放,避免了粮食分配不均的情况,也使救济活动卓有成效。

### (三) 慈善义演是中国传统慈善与近代慈善的结合体

中国传统救济思想为乐善好施、赈灾救民、扶贫济困等,对于贫弱的救助也较多体现为“临灾治标”,

① 《临时窝窝头会今日开成立会》,《京报》1924年9月18日。

② 王卫平、黄鸿山、曾桂林:《中国慈善史纲》,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1年,第36页。

③ 丁芮:《管理北京: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41页。

④ 《窝窝头会捐款之踊跃》,《顺天时报》1921年11月25日。

⑤ 《本年之窝窝头会》,《京报》1921年11月24日。

⑥ 《北京窝窝头会启事》,《顺天时报》1922年12月14日。

⑦ 《窝窝头会购面济贫》,《晨报》1921年1月31日。

⑧ 《窝窝头会成绩》,《京报》1923年1月20日。

以赈济、调粟、养恤为施救方式,即典型的临时性和临事性的治标施救,也是传统慈善的延续。进入近代之后,西方救济理念东来并对中国产生影响,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丰厚而独特,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孙中山在民国建立之初提出了民生主义理论,表达其关注民众生活的政治倾向。之后,北京出现各种类型的慈善组织,实施不同的捐赠和施救手段,如开办各类学校、养老院、残废院、慈幼院、孤儿院和医院,等等。<sup>①</sup>

晚清以来,民间救助方式经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以慈善为目的的筹赈义演逐渐兴起,<sup>②</sup>义演募捐也给近代慈善方式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因义演具有较强的娱乐效果,特别受到军、政、商界富人的追捧,募捐效果显著。义演由慈善组织举办,艺人出力献艺,各界人士积极参与,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担当,树立新的社会形象。每年窝窝头会举行义演时,“诸艺员热心公益,踊跃从事,上星期六及星期两晚观剧之拥挤,为从来所未有,亦可见社会人士对于慈善事勇往直前也”。<sup>③</sup>

在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西方公益慈善理念和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开始融合,慈善活动在中国的本土化走向和它产生的社会效用,使更多的组织机构积极参与慈善救助活动。在这一文化交融进程中,西方文化传入了西方慈善思想理念,也传播了多样的慈善活动方式,中国文化对西方慈善理念的吸收与借鉴,也不断丰富传统慈善方式。以义务戏的方式筹款募捐,开始具有近代意义的公益慈善内涵,慈善义演成为传统慈善与西方慈善的结合体。

#### (四)义演募捐面临艰难与困扰,反映社会弊端及其危害

按照现代价值观念,窝窝头会从事慈善活动、帮助穷人度过年关,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和缓解社会矛盾具有较大贡献,但是还原历史情景,时人对义演筹款的评价却褒贬不一,可见确实存在某些社会弊端。

演戏筹款用于赈灾济贫,无论在梨园行内互助还是窝窝头会义演筹募,初期的慈善救助作用显而易见,但之后问题陆续出现。如政府巧立名目强迫艺人演戏筹款,主办者借义务戏中饱私囊,义演过于频繁成为艺人负担等。民国北京改为北平后,窝窝头会义演变得较为艰难。如在1928年,窝窝头会“拟于三月初旬,假第一舞台,演唱义务夜戏,以资筹款”,<sup>④</sup>但“以时局关系,金融艰滞,恐销票为难,拟改秋后举行”。<sup>⑤</sup>此事遭时人猛烈抨击,导致人们难辨实情,思想混乱:“最近临时窝窝头会,又藉口筹款,迫令各班停演,演唱义务戏三日,所派戏码,皆为各班靠为穿衣吃饭之重头戏,其实并有伶界败类,勾引披掇,因此伶界人物,苦痛异常,不从则有种种危险,从之则自己饭碗,不久则全为义务戏砸破,故近日伶界各行人物,无不怨声载道云。”<sup>⑥</sup>

艺人参与义演本为救助社会贫寒人士,但在军阀强迫下频繁“义演”,苦不堪言。“兹闻伶界方面,以义务戏筹款,从前原为窝窝头会及本界失荣帮忙,每年初只演两次。以后奉直鲁军阀,入京后利用高压力量,强迫演唱。以后每年义务,多时至十次演唱,唱后各戏园营业,非半月后,不能恢复。”故遭艺人排

① 《民国十二年北京内外城慈善组织的类型与数量》,转引自王娟:《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② 朱泚:《晚清筹赈义演的兴起及其意义》,《史学月刊》2018年第8期。

③ 《今年窝窝头会义务戏之成绩》,《顺天时报》1923年1月11日。

④ 《窝窝头会从善如流》,《顺天时报》1928年4月21日。

⑤ 《窝窝头会缓演义务戏之两函》,《顺天时报》1928年4月21日。

⑥ 《谈义务戏(无名氏寄)》,《顺天时报》1928年4月13日。

斥,并将怨恨迁怒于名角,造成人心涣散和活动困难:“在梨园公会开会时,各角一律反对,千余人呼声震天,并痛骂各名角,不应以我们饭碗,供讨好阔人之用。”<sup>①</sup>由此看来,具有社会意义、以公益为初衷的慈善义演,因缺乏完善的法规与机制,社会环境不能提供发展支持和保障,难免遭受创伤。

## 结语

综上所述,窝窝头会是民国初年北京一个成员复杂的临时性慈善组织,最初的发起人为琉璃厂赏奇斋的古董商人程启元。在窝窝头会的骨干会员中,既有宦官政要,又有商绅善士,既有戏界艺人,又有报界义士。尽管它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慈善团体,但因不少成员根植于当地社会高层,背景深厚,加之主要成员酷好戏剧,热心演艺活动,且能吸引诸多艺界名角和名班社参与活动,显身献艺,因此在历年的演戏筹款活动中,得到政府辅助和社会各界支持,其赈灾助贫活动声势很大。由于这些因素,窝窝头会在民初北京慈善界具有较大影响且贡献显著。

窝窝头会实行新型义演方式筹款助赈,慈善活动计划周密、程序严谨。该会在义演捐助中采取印制和发放票券散放米粮、通过划分贫困标准进行有区别的救助,在完成慈善捐赠后又以征信录于报刊公示,由此表明,窝窝头会慈善活动的组织较为完善。然而,其救济手段仍为应急式的消极救助。

窝窝头会组织义演活动筹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初社会慈善活动的发展态势。慈善义演从上海、北京、天津等大都市开始,社会各阶层的参与日见增多,演出内容呈繁华多样趋势。其组织运行主要采用商业经营方式,捐资管理规范有序,呈现出中国慈善活动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典型过渡性特征。这一社会事象的出现,映照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发展,也折射出近代西方慈善理念在中国的传播与相互交融。同时,从水旱灾害救助、慈善文化特征、社会风尚衍变、近代城市样貌,尤其是民国初期的社会-政治生态等各个方面,可见窝窝头会的慈善义演在当时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并颇具京城特色和较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责任编辑:李光伟

<sup>①</sup> 《伶界对于义务戏之办法》,《京报》1928年9月14日。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of studying abroad has provide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Maritime Silk Road literature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Keywords: studying abroad literature; "Maritime Silk Road literature"; cultural break-in; cultural creation

### **The Formation of New Poetry Styles and Campus Journals: Take *New Tide* and *Tsinghua Weekly* as Examples**

Wang Xuesong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different new poetry styles paid great tribute to *New Tide* and *Tsinghua Weekly*, the most renowned campus journal.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verse styles, poets with *New Tide* did not make much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Verses were arranged following chronological order, with coherent sentences and attached forms. They put much emphasis on displaying a real world, thus lacking independent verses and poetic and artistic emotions. Kang Baiqing did experiment on the new forms of verses though. Liang Shiqiu, Wen Yiduo, Zhu Xiang and some other poets with *Tsinghua Weekly* put more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verses and stanzas. They emphasized on the independence and artistic value of verses, attached to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s of all kinds of forms. Both journal published poems with punctuation marks, and tried to set up convincing theories related. *New Tide* made use of punctuation marks to insert dialogues in poems, showing the benefits of punctuation in presenting reality, while *Tsinghua Weekly* wer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breaking of rhythm by the overuse of punctuation.

Keywords: *New Tide*; *Tsinghua Weekly*; New Poetry; style

### **A Study of Beijing Wowotou Society and Its Charity Performance in the Early Years of Republic of China**

Guo Changying, Liang Jiazhen

Abstract: The Wowotou Society was a temporary non-governmental charity organization initiated in 1912. It derived its name from making and distributing Wowotou to the poor at the initial stage, and usually launched relief and charitable activities in winter every year. The Wowotou Society raised money through charity performances. Due to the high participation of artists, and their large-scale but splendid performances, the Wowotou Society and its charity performance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generous donations as well as powerful support from celebrities in the military,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circles of Beijing. It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helping the poor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However,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Northern Government, this society's activity in Beijing gradually disappeared from public view.

Keywords: Wowotou Society; charity organization; year-end charity performance; poverty relief

### **Ciren Temple and the Leisure Life of the Scholar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ang Jiale

Abstract: Ciren Temple is located outside Xuanwumen, south of Beijing, which was once called Baoguo Temple during the Liao Dynasty. Since the time of Chenghua in the Ming Dynasty, Ciren Temple has become a royal temple, and the scale of its construction has expanded. During the Shunzhi Period, the City Temple, which once was located in the west of capital city of the Ming Dynasty, moved into the Ciren Temple. During the Kangxi Period, the Ciren Temple Fair developed into a commercial place that can most represent the scholar cultur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n the reign of Shunzhi and Kangxi, Ciren Temple enjoyed a great reputation, it has become a place for scholars to spend their daily leisure, where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i and poets, celebrities and officials came and made friends, exchanged poems and wine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Ciren Temple has a variety of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unctions as a public field and a leisure complex. A deeper observation of the various sentiments of the Ciren Temple provides an approach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daily life of people in Beiji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Keywords: Ciren Temple; scholars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leisure life